



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专著系列**

本专著系列出版受暨南大学“211项目”资助

主编 朱卫平

制度、开放、集聚 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效率

Institution, Opening-up, Agglomeration and the Efficiency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顾乃华/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专著系列

本专著系列出版受暨南大学“211 项目”资助

制度、开放、集聚与 中国经济发展的效率

顾乃华/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制度、开放、集聚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效率/
顾乃华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 6
(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专著系列)
ISBN 978 - 7 - 5141 - 0787 - 6

I. ①制… II. ①顾… III. ①中国经济 - 经济
发展 - 研究 IV. ①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16394 号

责任编辑: 杜 鹏
责任校对: 王肖楠 康晓川
版式设计: 代小卫
技术编辑: 王世伟

制度、开放、集聚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效率

顾乃华/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88191540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880 × 1230 32 开 6.25 印张 165000 字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0787 - 6 定价: 1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2009年这60年里，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77倍，人均GDP增长了32倍。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量更是呈现加速扩张趋势：从1万亿元到10万亿元用了15年时间，从10万亿元到20万亿元用了5年时间，从20万亿元到30万亿元仅用了2年时间。尽管GDP增速在世界范围内独树一帜足以让我国引以为豪，但我们也应理性地看到，我国许多地方政府在实践中把GDP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而对发展的效率重视不够。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中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以及国内外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都说明：正确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在经济发展效率不断提升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

追求经济发展效率提升，就是要使GDP的增长具备包容性特征。所谓包容性增长寻求的是在制度适时演进保障下，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它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对立。可见，实现包容性增长至少应包括以下要素：经济增长与制度演进齐头并进；强调投资和贸易自由化；重视劳动者收入占比稳定提高，让劳动者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集约利用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等等。有鉴于此，本书选择制度、开放、集聚这三个关键词作为切入点研究中国经济体制转型期的经济发展问题，内容共分为九章，各章内容安排如下。

第1章：“府际关系、关系产权与经济效率演进”。本章引入关

系产权中介变量,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府际关系演变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并利用1978~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和随机前沿函数模型,对理论推演的假说进行实证检验。主要结论是:第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府际关系不断演进和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企业关系产权的广度在缩小,宏观经济效率在提高。第二,随着纵向府际关系从“分灶吃饭”过渡到分税制、区域统筹,横向府际关系从地方保护主义盛行走向招商引资竞争、产业协作,因企业关系产权随之一同演变,在剔除产业结构、投入因素的影响之后,GDP分别提高了9.7%和12.7%。实施分税制改革和统筹区域发展政策,确实有助于提升经济发展效率。第三,我国地区之间的TFP差距在时序上并非均衡演进。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伴随着企业关系产权广度缩小、资源配置市场化程度加大,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TFP差距逐渐形成并扩大,由此导致的GDP差距约占GDP总额的3~4成。

第2章:“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基于省市政策互动视角的理论 with 实证研究”。本章基于省市制度互动视角,探讨了在我国特殊的体制背景下城市化作用于服务业发展背后的制度和政策机制。内容围绕如下关键点进行探讨:当前我国以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公共财政为改革主线,以省级政府为“第一行动集团”的中间扩散性制度变迁,对我国城市化和服务业互动发展究竟产生怎样的影响。通过理论分析和对由23个省份样本、252个城市样本构成的二层数据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的结论是:在我国经济转型期,城市化进程是影响城市服务业增长速度和比重的重要因素;在城市利用城市化推动服务业发展背后,所属省的制度和政策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通过改变城市化对于服务业发展作用的强度,间接影响所辖城市的服务业增长速度和增加值比重,这意味着制度变迁进程在省份之间的不均匀分布也会成为城市服务业发展不均衡现象的一种生成机制。

第3章:“21世纪以来我国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与FDI外溢效应

的俱乐部特征”。本章测算了2001~2008年我国大陆各省区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利用面板门槛模型,以人均GDP为门槛变量,实证检验了FDI与TFP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2001~2008年我国TFP整体呈上升态势,但TFP水平和增速在地区间不平衡的现象比较突出。FDI的外溢效应呈现俱乐部特征:在经济发达地区FDI会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而在欠发达地区FDI则不会产生正向的外溢效应。

第4章:“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全球价值链控制能力与产业效率”。本章依据分工理论和全球价值链模型,基于2002年和2007年投入产出表数据与随机前沿函数方法,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了我国产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产业效率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就整体而言,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有利于提高产业技术效率。但由于我国产业缺乏控制研发、营销等核心价值链环节的能力,附加值主要源自生产环节,且需以接受中间投入品价格转移为代价。

第5章:“我国劳动收入占比时空特征研究:基于结构分析的视角”。本章基于收入法核算的分省GDP数据,从GDP内部构成、产业结构、空间结构等维度切入,考察了我国劳动收入占比的时空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993~2007年我国整体劳动收入占比先微幅上升然后大幅下降,直接原因在于受营业盈余占GDP比重上升的挤占,深层原因则与我国以招商引资形式进行的地区竞争弱化了劳动者对企业所有者的博弈力量相关;三次产业收入占比分别呈现在徘徊中上升、先上升继而下降、基本保持稳定演变特征;东部地区劳动收入占比显著低于中西部地区,省际间劳动收入占比的差距日趋缩小。

第6章:“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区域与产业特征互动的视角”。本章基于区域与产业特征互动的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影响制造业劳动收入占比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的资本深化、技术水平提高往往都会伴随着更密集的人

力资本投入，导致劳动收入占比提高；市场化进程因弱化了国有企业承担的社会职能，在短期内劳动收入占比往往会下降；地方政府间围绕外资招商展开的竞争，增大了外企资本对工人博弈力量，不利于劳动收入占比提高；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国际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背景下，为扩大产品出口需要在产品中镶嵌更多的知识投入，因此，伴随一个地区的外贸扩张，其制造业劳动收入占比往往会提高。

第7章：“我国土地财政区域差异的成因”。本章旨在揭示我国土地财政的量化特征和区域差异的成因。研究表明，目前我国省际间土地财政强度差别较大，且在2003~2007年呈现先下降继而小幅上升的变化轨迹。从东、中、西三大地带看，土地财政强度呈现“东高西低”格局。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支持土地财政动因的“GDP锦标赛说”而拒绝“财政压力说”。正是发展条件不同的各地区围绕GDP增长展开锦标赛，将土地作为招商引资筹码，以及推动城市扩张和大力发展房地产业的载体，从而导致了土地财政的区域差异。

第8章：“我国城市生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的外溢效应及其区域边界”。本章利用城市样本数据和多层线性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的外溢效应及其区域边界。研究发现，我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显著提高本地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的外溢效应存在区域边界，省层面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所辖市工业的TFP无显著的相关关系。

第9章：“产业互动、服务业集聚发展与产业转移政策悖论”。本章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切入，引入产业互动、服务业集聚等概念，阐述我国产业转移促进政策背后的悖论及其形成机理，并利用空间计量方法和广东数据对相关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由于在服务与工业之间存在产业互动效应，而且服务业集聚发展特征显著，因而从发达地区转移出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欠发达地区转移出劳动力均会负向影响服务业集聚程度，进而削弱了产业互动效应。

目 录

第1章 府际关系、关系产权与经济效率演进	1
1.1 引言和相关文献述评	1
1.2 府际关系演变与经济效率变化：基于关系产权 视角的理论分析	3
1.3 府际关系演变、关系产权变迁与经济效率变化	12
1.4 实证检验	16
1.5 本章结论和启示	25
第2章 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基于省市政策互动视角的 理论与实证研究	27
2.1 引言和相关文献述评	27
2.2 省市制度互动、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 分析框架与假说	30
2.3 计量模型和实证分析结果	42
2.4 本章结论和启示	49
第3章 21 世纪以来我国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与 FDI 外溢 效应的俱乐部特征	51
3.1 引言和相关文献述评	51
3.2 2001 ~ 2008 年间我国地区 TFP 测算	55

3.3	FDI 与 TFP 关系检验	61
3.4	本章结论和启示	69
 第4章 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全球价值链控制能力与产业效率		
4.1 引言和相关文献述评		
4.2 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贸易与产业效率		
4.3 实证检验		
4.4 本章结论和启示		
 第5章 我国劳动收入占比时空特征研究：基于结构分析的视角		
5.1 引言和相关文献述评		
5.2 我国整体劳动收入占比时序演变趋势		
5.3 三次产业劳动收入占比时序演变趋势		
5.4 我国劳动收入占比的空间特征		
5.5 本章结论与启示		
 第6章 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区域与产业特征互动的视角		
6.1 引言和相关文献述评		
6.2 产业与区域特征互动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		
6.3 实证检验		
6.4 本章结论和启示		
 第7章 我国土地财政区域差异的成因		
7.1 引言和相关文献述评		
7.2 我国土地财政区域差异的定量描述		

目 录

7.3	土地财政的动因：财政压力抑或 GDP 锦标赛	125
7.4	土地财政与 GDP 增长之间的传导机制	134
7.5	本章结论和启示	137
 第8章 我国城市生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的外溢效应及其区域边界		
8.1	引言和相关文献述评	139
8.2	转型期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外溢效应特征的理论分析	142
8.3	实证检验	150
8.4	本章结论和启示	158
 第9章 产业互动、服务业集聚发展与产业转移政策悖论		
9.1	引言和相关文献述评	159
9.2	产业互动与服务业集聚发展对“双转移”效果的影响	161
9.3	研究方法	167
9.4	实证检验结果	170
9.5	本章结论和启示	175
 主要参考文献		177



府际关系、关系产权 与经济效率演进

1.1 引言和相关文献述评

全要素生产率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是宏观经济学中测度经济效率的重要概念,也是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石。郭庆旺和贾俊雪 (2005) 指出,TFP 工具可承载如下两大功能:第一,通过估算 TFP 有助于进行经济增长源泉分析,识别经济是投入型增长还是效率型增长,从而确定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第二,通过比较 TFP 与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为制定和评价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提供量化指标,从而确定经济政策是应以增加总需求为主还是以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技术进步为主。我国学者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关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 TFP 演进问题,他们利用时序数据或省域面板数据,借助增长核算法、生产函数法、随机前沿分析法或数据包络分析法等,估算了我国不同时期整体经济层面、产业层面或企业层面的 TFP 增长率,这些研究为识别我国经济增长类型和出台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就整体经济 TFP 估算而言,代表性研究成果得到的结论如下。

舒元（1993）利用生产函数法估算了我国 1952 ~ 1990 年间 TFP 增长率，发现这个阶段 TFP 增长率为 0.02%，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为 0.3%。王小鲁（2000）的研究发现，1953 ~ 1999 年间我国 TFP 增长率为 -0.17%，1979 ~ 1999 年间 TFP 增长率为 1.4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14.9%。郭庆旺和贾俊雪（2005）在分析比较了 TFP 四种估算方法的基础上，利用索洛残差法、隐性变量法和潜在产出法分别估算了我国 1979 ~ 2004 年间 TFP 增长率，发现 TFP 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增长，是一种典型的投入型增长方式。比较不同研究成果的结论可以发现，尽管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呈现比较明显的粗放型特征，但在 TFP 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具体贡献份额问题上则莫衷一是。李宾和曾志雄（2009）通过数据模拟计算指出，造成 TFP 估算差异的原因除了核算方法和设定的要素收入份额差异外，最主要的是源自资本存量估算差别。截至目前，我国仍没有来自官方的资本存量统计数据，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多是根据永续盘存法自行估算。而利用永续盘存法估算资本存量数据，又需要历年投资流量、初始年份资本存量、价格指数、折旧率这四类数据。其中，投资流量又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等多种常用替代指标，而初始年份资本存量的构造、价格指数的选取、折旧率的设定则更是因人而异，因此，不同研究者估算出不同的资本存量数值也就不足为奇了。上述情形表明，要准确度量 TFP，首当其冲要解决核算方法和数据的科学性、权威性问题的。此外，我们认为已有研究更值得拓展的地方在于划分分析阶段过于随意，也因此他们对我国 TFP 演进特征的解释更多地是停留在数据解读上，而未能深入到因果机制层面。事实上，如果不分析 TFP 的决定因素，而是仅对其进行量化测度，那么能够为政策制定提供的有效参考信息是非常有限的。因为由此引申出的结论只能评判此前增长方式的优劣，但却不能指出改进的方向。也正因此，首创 TFP 概

念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罗曾自嘲地说，TFP（也称索罗剩余）度量的恰恰是“我们的无知”。有鉴于此，研究 TFP 的决定因素一直是经济增长理论及实证进展的主要方向和动力（彭国华，2005）。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学者创立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不是外生的，而是取决于经济体内部的行为。在国外，Hall 和 Jones（1999）、Acemoglu 等（1999）借助独特的工具变量，分别实证检验了社会基础设施、制度对长期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在我国，林毅夫和刘培林（2003）、刘秉镰等（2010）、王兵等（2010）分别从发展战略、交通基础设施、环境管制等角度研究了影响 TFP 的政策和自然条件因素。

本章沿着分析 TFP 的决定因素这个已被证明有意义和有前景的研究方向，引入府际关系、关系产权概念，探讨我国整体经济 TFP 非线性时序演进以及地区之间 TFP 差异非均衡演进的内在机制。接下来的内容将这样组织：第 1.2 节具体介绍我国府际关系演进与经济效率变化；第 1.3 节分析府际关系演变影响经济效率的内在机制；第 1.4 节是实证检验，包括实证模型描述、数据和计量分析结果；第 1.5 节是简短的结论和政策启示。

1.2 府际关系演变与经济效率变化： 基于关系产权视角的理论分析

府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学术语，其最早出现于 20 世纪 30 年代，但直到 50 年代才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所谓府际关系，根据美国学者安德森（Anderson W.，1960）所给的定义，其指“各类的和各级政府机构的一系列重要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

互作用”^①。相比之下，我国学者对府际关系的界定显得更为狭窄且更趋一致。如谢庆奎（2000）、陈振明（2003）等均认为府际关系等同于政府间关系，具体包括纵向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关系、地方各级政府间关系和横向的各地区政府间关系。谢庆奎（2000）进而认为府际关系主要由权力关系、财政关系和公共行政关系这三重关系构成。在这三重关系中，政治学学者们一般认为财政关系是府际关系的核心，这一点也与经济学理论不谋而合。熊彼特在1918年发表的《税务国家的危机》一文中指出，研究财政史往往可以使得人们能够“洞悉社会存在和社会变化的规律，洞悉国家命运的推动力量”，他认为，财政体制与现代国家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以至于可以把现代国家直接称为税务国家。张宇燕和何帆（1998）把熊彼特的上述思想概括为一个基本命题，即财政压力是国家推动改革的直接原因。同时，他们还认为，财政压力不仅是改革的起因，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改革的路径。古志辉和蔡方（2005）运用动态最优化和博弈论对1978~2002年我国财政压力与经济转型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他们的研究结论认为，提高中央政府调控政策的效率和财政收入是1994年税制改革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将财政关系视为纵向府际关系的核心比较切合实际，但其绝非横向府际关系的核心，用竞合关系概括横向府际关系核心或许更为恰当。当然，在横向的府际关系中究竟是竞争还是合作占据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则受纵向的财政关系决定。也就是说，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财政分权的程度，往往直接决定着下级政府之间是采取竞争还是合作的应对策略。

从纵向府际关系看，自20世纪初以来世界各国普遍出现了财政分权趋势。据统计，在全世界人口超过500万的75个转型经济

^① 转引自匡萍：《府际关系变迁与财政分权》，载《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中,84%的发展中国家正致力于向地方政府下放部分权力^①。赵志耘和郭庆旺(2005)也认为,财政分权是纵向府际关系演进的世界大趋势,但在不同类型的国家,其诱导机制却不尽相同。发达国家推行财政分权是为了在“后福利国家”时代以更低的成本提供公共服务;在拉丁美洲国家,实行财政分权源于人民追求民主的政治压力;在非洲国家,推行财政分权主要是服务于国家统一;在发展中国家,实施财政分权旨在挣脱治理无效、宏观经济不稳定和低经济增长的陷阱;经济转型国家倡导财政分权,则是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直接结果。就我国而言,从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这段时期内,主要实行的是统收统支的财政集中体制。财政集中体制与扭曲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一起被称为传统的“三位一体”经济体制模式,这是在经济系统封闭的条件下中央政府为解决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赶超战略派生的资本约束问题而设计的。高培勇(2009)从覆盖范围以及由此形成的财政待遇差异角度入手,将传统财政体制机制的特征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1)国有制财政,即财政收支活动主要在国有部门系统内部完成,非国有部门则游离于财政的覆盖范围之外^②;(2)城市财政,即财政收支活动主要在城市区域内部完成,眷顾到农村区域的财政收支(特别是财政支出)的份额严重偏低;(3)生产建设财政,即财政支出活动主要围绕着生产建设领域进行,以改善民生为代表的公共服务性支出项目被置于从属地位。不可否认,集中财政体制在建国初期对于调动全国资源、集中解决经济困难起到了较大作用,但其弊病也逐步显现,具体表现

① 原文出自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编:《走向“共赢”的中国多级财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这里转引自匡萍:《府际关系变迁与财政分权》,载《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② 据高培勇(2009)的统计,在1978年,来源于国有经济单位上缴的利润和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51%和35.18%,再加上带有准国有性质的集体经济单位的缴款(12.17%),合计达到了99.15%。

在：第一，地方政府不仅没有收入权，更没有自主的支出决策权，地方对中央高度依赖。中央政府在信息方面的劣势会增加资源误配的机会和财政运转成本，而且会忽略地方居民的偏好特征。第二，地方财政收入上缴和实际所得不对称，挫伤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张晏、龚六堂，2005）。

为了激发被传统经济体制几乎窒息掉的国民经济活力，从1978年开始，我国中央政府着手从分配领域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最初确定的改革主调便是“放权让利”，即由下放财权和财力入手，打破或改变“财权集中过度、分配统收统支、税种过于单一”的传统体制格局。高培勇（2009）认为，在改革初期出台上述整体改革思路具有必然性，因为当时政府能够且真正放出的“权”主要是财政上的管理权，政府能够且真正让出的“利”也只能是财政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所占的份额。根据我国纵向府际关系核心内容财政体制的变迁，以及受此影响的横向府际关系的变化，笔者将1978年以来我国府际关系的演进划分为三个阶段。值得指出的是，府际关系伴随政策改变而变得分界鲜明，是非常普通的现象。正如美国学者斯蒂尔曼（1988）概括的那样，动态性和受制于政策乃是府际关系的重要特征。府际关系的常态即表现为一种持续的、灵活的动态关系。由于政策的调整，政府之间往往会形成新的权力关系与权力结构。这三个演变阶段反映了我国政府在根据外部环境变化，不断地寻找、更新合理的分权模式，以及构建有利于促进“包容性增长”的地区竞合模式。尽管这种改革带有较强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性质，但事后看来整体演进脉络却是比较清晰、连贯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府际关系基本沿着向法定分权、纵向平衡的府际合作与横向多中心治理格局迈进，这与世界各国的府际关系变迁轨迹是一致的。就财政关系而言，尽管这三个阶段对应的核心内容有差别，历经了放权让利、分税制、支出结构调整等多个阶段，但它们之间同样虽彼此独立却也互为关联。高培勇（2009）认为，我国

30余年的财政体制改革，其主旋律就是不断向以“多种所有制财政+城乡一体化财政+公共服务财政”为特征的公共财政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靠拢和逼近。

1. 第一阶段（1978~1993年）：纵向“分灶吃饭”，横向以邻为壑。

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上，1978~1993年间我国先后推出“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以及“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上解递增包干、定额包干、定额补助”等多种不同的体制模式。在这一系列政策调整之下，地方政府在预算收入中的边际分成比例不断得到提高，中央与地方共享部分收入占总体预算收入的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85%下降到80年代末的60%。地方政府享有较大边际税收分成激励了它们去实行有利于本地经济增长的政策，Montinola等（1995）将这种因纵向财政分权导致经济高速增长的模式概括为中国特色的“保护市场的财政联邦主义”。得益于经济快速增长，中央也成功地扩大了其固定收入的规模，尽管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收入比值在逐渐下降。

从横向府际关系看，这个阶段的增长是以陷入省际以邻为壑的囚徒困境为代价的（陆铭、陈钊，2009）。虽然从全局来看，国内市场一体化有利于发挥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能够给各地区带来正向收益，但对于单个地区而言，在省际竞相发展经济的博弈中采取地方保护主义却是一个占优策略。也就是说，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增长而言乃是一把“双刃剑”：它所造成的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效应，一方面确实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发展经济的动力，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获得了分割市场和地方保护的激励。Young（2000）注意到，在分权体制下，中国实际上走的是地方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道路，他进而认为，各项改革推行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乃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地区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的重要诱因。Young（2000）